



## 關於「四十二章經」的考證

蔡惠明

「四十二章經」是中國最早譯出的一部佛經。東漢明帝遣蔡愔等十八人到大月氏國求佛法，永平十年（西元六十七年）請得迦葉摩騰、竺法蘭兩尊者用白馬馱經來到洛陽。第二年，明帝敕建白馬寺，讓摩騰、竺法蘭在寺講經，並請他們從事梵本佛經的漢譯，「四十二章經」就是在此時譯出，標誌着中國漢譯佛經的開始。

「四十二章經」，一卷，內容乃撮取小乘群經而成。傳本有多種，支字頗有出入，且經後人竄改，增加大乘新義，而以現行本爲尤甚。梁啓超在「近著」第一輯中卷評稱：「隋費長房『歷代三寶記』本經（『四十二章經』）條下云：『舊錄』云，本是外國經抄，元出大部，撮要引俗，似此『孝經』十八章。此言經之性質甚明瞭。蓋並非根據梵文原本比照翻譯，實撮取群經精要，摹仿此土『孝經』、『老子』，別撮成篇，質言之，則乃撰本

而非譯本也。」費長房所引的「舊錄」，無從查考。但他認爲經言係「外國經抄」，並非中土編撰，恰是可信的。今存的巴利佛經，也不乏類似「孝經」的文體，如 *Suttanipata* 集合佛說多章而成，其中有些章節又很短，往往見於「阿含經」或其他大部經典中。「祐錄」卷七「法句經序」中說：「佛說原有十二部經，四部『阿含』，是後五部沙門，各自鈔採經中四句六句之偈，比次其文，條別爲品。於十二部經靡不斟酌，無所適名，故曰『法句』。」晉道安「道行經序」也載：「佛泥洹後，外國高士鈔九十章爲『道行品』。」「祐錄」也有「孝明皇帝四十二章」的記載，可能是「四十二章經」的舊名，因那時從大部中撮要抄爲一部「四十二章」，未稱爲經。但不能由於它類似「孝經」，而斷爲「中國所撰」。實際上，東漢末牟子作「理惑篇」，東晉時郗景興撰「奉法要」都曾引用過「四十二章經」，可見此經早爲佛教徒所傳誦。但東晉與東漢相差三百年，古人傳抄，極爲困難，因

此道安編「綜理象經目錄」時竟缺此經。這事見「祐錄」卷二載：「『四十二章經』一卷，『舊錄』云：『孝明皇帝四十二章』，安法師所撰錄闕此經。」這裡所指「舊錄」是指晉成帝時，沙門支愍度所作的佛經目錄。當時「方等」風行，經出更多，「四十二章」為常日所不備，道安可能沒有看到，因此未編列經錄，但不能因此得到結論：「四十二章經」並非摩騰、竺法蘭所譯。

梁啟超認為「四十二章經」是偽書，理由是譯文不似漢譯文體，現存「四十二章經」經文流暢，文字優美，只有三國兩晉時譯的佛經才符合當代文風。經考證，「四十二章經」原有兩種譯本，其一是摩騰、竺法蘭的漢譯本，另一種則是吳支謙的譯本。據「大周經錄」卷八載：

「『四十二章經』一卷（初譯六紙）。」後漢明帝代永平十年，迦葉摩騰共竺法蘭於白馬寺譯，出『長房錄』。

「四十二章經」一卷（第二出）。吳支謙譯，與摩騰譯者少異。

「四十二章經」（第三出），見「長房錄」。上三經同本別譯。」

但查「長房錄」，僅有第一、第二出，沒有第三出。至於支謙所譯，「長房錄」記載說：「『四十二章經』一卷，第二出與摩騰譯者小異，文義允正，辭句可觀。」漢譯文句、樸質無藻；而劉宋以後，隨着時代文風的變異，譯文就優美流暢。古人寫經，往往不注意譯者，而將早已失佚的第一出誤為支謙所譯，流傳至今，因襲未改。這就是梁啟超誤認「偽書」的原因。再從郝超「奉法要」引的「四十二章經」和高麗藏經的「四十二章經」一段對照：「奉法要」引經云：

「佛問諸弟子，何謂『無常』？一人曰：『一日不可保，是為無常。』佛言：『非佛弟子。』一人曰：『食頃不可保，是為無常。』佛言：『非佛弟子。』一人曰：『出息不報，便就後世，是為無常。』佛言：『眞佛弟子。』」

高麗藏經本則載：

「佛問諸沙門：『人命在幾間？』對曰：『在數日間。』佛言：『子未能爲道。』復問一沙門：『人命在幾間？』對曰：『在飯食間。』佛言：『子未能爲道。』復問一沙門：『人命在幾間？』對曰：『在呼吸間。』佛言：『善哉！子可謂爲道者矣。』可見漢晉譯本雖文字有所不同，但經義則是一致的。據此而認為偽書，顯然是因噎廢食，顛倒是非了。

梁啟超又稱「四十二章」頗含大乘教理，它的偽作者一定深通老莊之學，旨在調和釋、道思想。這種說法也不正確。因為「四十二章經」版本多達十數種，文字出入，多寡不等。但可歸納爲三系：（一）麗本。（二）宋眞宗注本。（三）宋守遂注本。麗本出於北宋初蜀版，採用唐以來公認的經典。而眞宗注本與守遂注本則有所增刪。如麗本在「牛行深泥章」之前，有「摘懸珠章」。眞宗注本合爲一章，守遂本則僅存後一章。「四十二章經」是撮取羣經而成的有很多章見於巴利文經和中國佛典，但較爲簡畧。如果將三本對照，可以證明：麗本常合乎原文，眞宗本和守遂本則不悉依原本，妄加臆測。尤其守遂本，不但在文字上刪改，還增加了新義，舉例如下：

（一）守遂本卷首，多「四諦法輪」一章。

（二）增添了「內無所得，外無所求，無念無作，非修非證」章。

（三）人有二十難，麗本只言五難，而守遂本加了「心行平等、見性學道」等十五難。

(四)麗本原爲「吾何念？念道；吾何行？行道；吾何言？言道。」被改爲：「吾法念無念念，行無行行，言無言言，修無修修。」

(五)「牢獄章」末加「凡夫透得此門。」

(六)「牛行深泥章」前增「磨牛章」，還說：「心道若行，何用行道？」

(七)末章多了「視大千世界如一河子」等十一句。

這些枝蔓，把「四十二章經」原義改得面目全非。古本「四十二章經」說理平易，沒有大乘的圓義和老莊的玄談。而真宗本、守遂本恰添增了「見性學道」、「無修無證」等大乘義理。漢代佛經留存頗少，「四十二章經」又是第一部漢譯佛經，確爲研究中國佛教的重要資料。但經過竄改，失其本真，令人難辨真僞。這是引起梁啓超懷疑的根本原因。

「四十二章經」原出小乘經典，但取其所言，與漢代流行道術比較，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。這就說明，人心相同，所信的道理也常常相似。另一方面，漢代道術受到佛教傳入的影響，吸收並融化了佛教教義。如「太平經」有「精思」、「精明」、「不精之人」、「精進」等說法，東漢學者襄楷在「上桓帝疏」中說：「浮屠不三宿桑下，不欲久，生恩愛，精之至也。」這裏，「浮屠不三宿桑下」，源出「四十二章經」，而「精進」則引自康僧會「六度集經」卷六：「精存道奧，進之無怠。」襄疏又說：「天神遺似好女，浮屠曰：『此革囊盛血』，遂不盼之，其守一如此，乃能成道。」天神以玉女試道的故事，兩次見於「太平經」，但都是引自「四十二章經」。再就本經諸章內容來看，則可見於巴利文和漢譯佛典，說明決非中國人所僞造。梁啓超所指含老莊玄理，可能是一種誤會。

最近在山西趙城發現的金刻大藏經中的「寶林傳」中，其卷一載有「四十二章經」。引人矚目的是：(一)行文常用韻語，如「仰天唾章」云：「佛言：惡人害賢者，猶如仰天唾，唾不及天公，還從己身墜。逆風揚惡塵，不能污上人。賢者不可毀，禍必降凶身。」這段在巴利文中，雖爲偈言，但漢譯本中，並非韻語。(二)「寶林傳」載此經，除文字稍有出入外，與守遂本相同，舉凡增加的「無念無住」、「見性學道」等大乘義理，兩本基本相同。「寶林傳」是晚唐智炬所撰，專爲禪宗僧人立傳的僧傳。「無念無住」、「見性學道」原爲禪僧的口頭語，可見這些修改，是有其思想根源的。用韻語行文，則是循宗門的習慣。又在杭州發現的宋紹興二十九年石刻的「四十二章經」。經末有西蜀武翊的跋文，寫道：「迦葉、竺法譯於前，智圓訓於中，僭僂序於後。」石刻經文與守遂本大體相同。孤山智圓的注疏已佚失。但「釋門正統」曾載智圓的序文說：「古者能仁氏之王天下也，象無象之象，言無言之言，以復羣生之性。」這裏「言無言之言」引自守遂本的「言無言言」，依此推論，石刻經也用了禪宗所傳之本(寶林本)。智圓是宋天台宗僧人，但深受禪宗的影響。西蜀武翊的跋文還稱：「『四十二章經』與『太易』、『老』、『莊』相表裏，可見新改的經本不僅加入了大乘教義，而且其言可與道家玄理相附會，看來宋人比梁啓超早就作此評價了。但這些「四十二章經」的本子既然並非真本，那麼據此推言「四十二章經」是魏晉僞作，也就失掉依據。

綜上所述，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：現存的「四十二章經」應以吳支謙的譯本爲准。其他宋真宗本、宋守遂本等雖添加大乘義理，調和釋、道思想，但並非僞造。「四十二章經」乃撮取小乘羣經而成，它不同於其他佛經，只環繞單一的中心施教。又因爲是原始佛教的教理詮釋，它的思想性很強，對修學有實用意義。且經文不長，言簡義賅，便於持誦。因此是值得推廣與研究的。